

永恒的歌唱

云南民族民间歌谣与民族死亡观研究

◎ 陈艳萍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永恒的歌唱

云南民族民间歌谣与民族死亡观研究

◎ 陈艳萍 著

艺术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歌唱: 云南民族民间歌谣与民族死亡观研究 / 陈艳萍著.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482-0000-0

I. ①永… II. ①陈… III. ①民歌—文学研究—云南省②少数民族—死亡哲学—研究—云南省 IV.
①I207.7②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4680号



策划编辑: 柴 伟
责任编辑: 柴 伟 严永欢
封面设计: 卢 斌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佳迪兴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166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0000-0

定 价: 26.00元

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总序）

杏坛拈花

2000年9月，历史将我推到了云南艺术学院院长的位置上。

深感责任重大的我，首先想到的事情是：一所边疆综合艺术院校的生存状态与发展可能是什么。如何不辜负上级组织和广大教职工的厚望，在自己的任期里达到新的发展高度，获得新的办学收成。

在我上任前一年，1999年，我们刚刚开展过一次活动，就是云南艺术学院的建设发展40周年校庆。那一次活动给我留下了悠长的思索：云南艺术学院在历届领导班子努力、一代又一代教职工奋斗和学生们的热情簇拥下走过了40年的艰辛道路，取得了桃李满天下的巨大成就，为今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高度和前进起点。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成为新班子新生代的历史任务。在总结经验，盘点家当，为成绩骄傲的同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本科教育办学有较长历史，但没有研究生教育层次；实践型队伍创作能力强，但理论成果少；历史的错综与道路的曲折，体现在校园建筑的犬牙交错状态与后院因为缺少投资而闲置荒芜的情况当中；规模小、社会影响力不够而被提议“合并”的悬剑仍在项上……硬件建设与软件建设的迫切性，成为新里程途中首先遇到的关隘。

勒紧裤带，创造条件建设校园。我们设法获得政府的支持，废除了穿过校园、将校园一分为三的不合理的城市规划道路，从而获得了校园被占用的近20亩土地；建成了美观、现代、受人交口称赞的12000平方米的四号教学楼；购买了后门外4300余平方米的楼房成为五号教学楼；购买了紧邻校园的

倒闭工厂的20亩土地，拓宽了校园空间；建设起了13 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学生公寓留学生楼和完成了虽然不豪华但是在云南省属最高专业水准的12 000多平方米的展演中心——剧场、展厅、藏画室、陈列室。极大地满足了教学发展的需要，扩大了办学规模，后来顺利通过了2004年的教育部的本科教育水平评估，获得了“良好”的等级。

但是，这个等级绝对不仅仅靠这些办学条件的创造，更重要的因素，来自教学、研究、创作展演鼎足而三、齐头并进的发展成果。认识到这些，并在常态工作中变为现实，实在是教师艺术家们、同事们殚精竭虑思考云南艺术学院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凝聚起来的群体智慧和在实践过程中付出的共同努力。

我们明确云南艺术学院教学、研究、创作展演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基点（核心课程）、热点（新学科新领域课程）、特点（传统优势和地域资源课程）的课程结构体系；强调地处边疆、便于与民间艺术互动、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结合的发展立足点；突出教学中的实习、实训、实践、实战、实用环节借以增强云南艺术学院学生动手能力，成为办学亮点；探索云南艺术学院依托地区资源和政府支持能够长足发展、具有不可替代性意义和寓个性价值于共性原则的教学体系；我们开始凝练大舞台（戏剧、舞蹈、音乐）、大美术（国画、油画、版画、壁画、雕塑、公共艺术、视觉传达、平面广告、环境艺术、室内装潢、产品包装……）、多媒体（电影摄影、电视摄影、录音剪辑、电脑辅助设计、广播电视编导与制作、动画绘画、动画制作、摄影广告、电视广告、网络设计）和新交叉（艺术生产与管理、艺术经纪人、艺术法规、民族艺术与人类学、教育与戏剧）4个学科大类，将综合艺术院校的综合优势、交叉能力发挥到最大。在明确的思路被教学单位贯彻和被艺术教育家、学者们掌握的情况下，成绩巨大。云南艺术学院的学术能力、学科建设能力、专业建设能力和课程设置能力，有了巨大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有了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设计艺术学、舞蹈学和艺术学6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戏剧学、音乐学、美术学3个已经建成挂牌的云南省级重点学科和艺术学1个在建的省级重点学科；有戏剧（影视）文学、和声、绘画3个省级重点专业，有“戏剧概论”、“视听语言”、“作曲”、“图形创意”4门省级精品课程；有了被国家权威机构组织5 500余名专家认真“定性”评审、在学术影响力、社会贡献率等9项指标“定量”衡量后、从24 300余份期刊中筛选出来、最后认定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类）”

的《云南艺术学院学报》作为学术高地与交流平台与国际国内风云对接的窗口；有全省“艺术类师资培训基地”的重托；成为云南省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授权点建设单位……硕士点、艺术硕士点、教师硕士课程教育点、艺术本科教育、艺术专科教育、艺术高等职业教育、留学生教育，云南艺术学院的办学，已经逐渐进入了教学、研究、创作展演的良性循环。

我们正在由传统的教学型走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而创作展演，是检验教学研究和服社会、贡献文化产品的关键。

我们的转型发展中，研究平台的建设和锻炼队伍的措施，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研究项目和创作项目来锻炼队伍，检验研究成果，经验证明是一种良好的方法。

2001年8月，我们组织出版了云南艺术学院重点学科丛书第一、第二辑共20本，主要分布在戏剧学、美术学和音乐学3个学科，还有艺术学。8年过去了，除了不断支持特色教材丛书和精品课程丛书的出版之外，学院各个教学单位和研究单位，也不断支持教职工出版研究和教学成果。我始终认为，一个学校的办学传统和办学成果，一定要有物化形式来承载，否则，在人事代谢、岁月沧桑之后，一所有历史的学校，它的办学成败、优劣、特色和常态，都将会随风而逝，将会成为一种不确定的民间传说。我们积极推动的云南艺术学院特色教材丛书、云南艺术学院精品课程丛书和云南艺术学院重点学科丛书就是重要的物化形式。加上其他不同形式的出版物、制度化的规章制度等等，都成为云南艺术学院办学历史的承载平台，同时会成为学校发展的现实推进器。教材建设、课程建设、专业建设和重点学科丛书建设，就是实实在在的办学核心内容，通过这些建设使师资队伍的建设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措施、手段和重要检验标准。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把恒常的工作和持续的努力回顾一下，来路的景点集中起来观察，成果丰硕。而且，学科建设的成果扩大到了设计艺术学、电影电视学、舞蹈学、艺术学。不但是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欣赏、艺术家研究，而且，对艺术人类学、艺术教育领域的研究也有重要收获。尤其是艺术教育学内容的艺术教育政策、艺术教育规律、艺术发展生态等等的研究，在艺术教育被“艺术考生热潮”推动着迅猛发展、办艺术教育成为办学热点的时候，显得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8年前，我在为重点学科丛书写序的时候，书写的是《必要的基石》，讲述的是学术“兴校、强校、名校”的道理；今天，怀着喜悦的心情，打量我

们在学术基石上有了长足发展的教学单位、学科点和专业，抚摸坚实的学术基石上沃土沛然的杏坛，阅读教师们捧献出的杏坛执鞭生涯中产生的研究成果，就像是在欣赏艺术教育的杏坛中争奇斗艳的花朵，芬芳扑面，清新怡人。

身在杏坛27年，如果算上自己念师范中文系的4年岁月，就是31年。从未离开教学岗位和研究领域的我，在与同行探讨教学、交换心得的过程中，自信懂得教师、职工和艺术教育家们的情感方式和情感内容，深知他们的喜怒哀乐，深知耕耘在校园里的教师们那琐屑的辛苦与平凡的伟大，深知杏坛中人那份苦口婆心的后面有多少“三更灯火五更鸡”的自我激励、自我要求、自我敦促的修为。我要在云南艺术学院新的重点学科丛书（第三、四、五辑）出版之际，向云南艺术学院的辛勤园丁鞠躬致敬，感谢他们对云南艺术学院党委和行政一代又一代的领导班子的支持和信任，感谢他们在我学习教育管理、办学育才的这9年中用认真教学、热情创造和潜心研究的实际行动对我的认同和帮衬。

阳春三月，花艳南疆。常言：杏花，春雨，江南。但是，我熟悉的是南疆，不是江南。也曾江南看花，花繁春深；更多南疆踏春，春深如海。南疆花香拂面的时候，我往往油然而生一番比较的心思：较之江南的杏花，亭台楼阁，柳丝烟雨，令人生怜；南疆的杏花顶骄阳、远好雨、亭亭于高山野坝，却别有一种倔强的热烈、艳丽的天然，使人生慕。

云南艺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家们，就是南疆的杏花了。在繁忙教学工作、管理、服务的间隙，在重要的社会资源分配的末梢和幸运青眼顾盼的盲点，他们的顽强坚持和奋力拼搏，往往比生活在占尽天时地利的中心城市的教育家、艺术学者们付出的多得多。而且，获得的艺术影响和社会名声，还远不如后者。正因为如此，他们是可敬的、为数更多的一群人。中国大地上，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里，春光是由他们铺就的。

正逢云南艺术学院建校50周年的日子，出版重点学科丛书意义特殊。杏坛拈花，不敢微笑，只有回顾的记忆和瞻望的沉思。因为，我不是智者，我只是杏坛执鞭的一个劳作者，和作者们一样。

是为序。

吴 戈

2009年仲春于昆明麻园

目
录

杏坛拈花（总序）	吴 戈 001
第一章 导 论	001
一、研究死亡问题的意义	002
二、国内外对死亡问题的研究现状	007
三、本课题研究方法及框架结构	018
第二章 云南少数民族死亡观的起源和初期形态	023
一、万物有灵观与自然崇拜起源	024
二、自然崇拜在民间歌谣及民俗生活中的表现	028
三、事死如事生的祖先崇拜	037
四、原始崇拜与民族死亡观	049
第三章 宗教文化交融中的死亡观	053
一、藏 族——劝善止恶 以享来世	054
二、傈僳族——彼岸玄思 天堂地狱	065

第四章 情爱中的生死观	075
一、纳西族——放弃此生 以求美满	076
二、拉祜族——芦笙恋歌 生命的歌	086
三、傣族——情祭情歌 情别恋歌	096
四、基诺族——此生悲歌 来世姻缘	111
第五章 回族生死观——生死如一 两世吉庆	123
一、云南回族歌谣中的死亡观	125
二、信主与忠君的现世观	129
第六章 结语 云南少数民族死亡观	135
参考文献	149
致 谢	157

第一章
导
论

一、研究死亡问题的意义

（一）死亡问题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

在人类文化中，各民族文化都非常关注人类的死亡问题，可以说死亡是人类永恒的焦虑。死亡，是一个永恒的斯芬克斯之谜，是宇宙之谜中最难解的一个。死亡，是任何尘世中的人都无法逃脱的命运，从出生之日起，我们就一步步向着生命的终点迈去，谁也无法回头。死亡，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割断了生命的延续，摧毁了人类不朽的愿望，因而成为人类永恒的焦虑和恐惧。正如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所指出的：“在人生的各个发展阶段，始终存在着死亡的恐惧。死亡是恐惧的最本质对象。”^①

由于死亡是每一个人的共同命运，因此，自人类产生意识以来，就从未停止过对死亡的思考。可以说，对死亡的焦虑和思考，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意识，并且成为人区别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这是因为，只有人类能领悟到生命的有限性。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在远征希腊的途中，望着自己率领的浩荡大军，不禁伤感而泪下。他对自己的叔父说：

“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100年后，这支浩荡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②人生苦短，百年如梦，面对谁都难免一死的无情现实，古今中外的无数诗人、哲人留下了无尽的感慨与感叹。

然而，知道自己天生丽质却迟早要回归地下、默默腐烂，这并不影响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出类拔萃和高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不断地认知和思考死亡这一终极关怀问题。而“在对死亡的认知中，乃产生了一种文化的世界景观，由于我们具有这种景观，便使我们成为人类，而有别于禽兽”^③。正如帕思卡尔所指出的：“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于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

①〔丹麦〕克尔凯郭尔，张祥龙译：《致死的疾病》，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7页。

②〔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英文版），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8页。

③〔德〕斯宾格勒，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台北华新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305页。

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时间和空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①

在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问题时，死亡成为人类心灵深处永恒的焦虑，与此相伴的是，永生就成为人类亘古的向往。古希腊神话传说中讲到，当俄底修斯与希腊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在冥界相会，俄底修斯因阿喀琉斯在冥界享有崇高威望而向他表示祝贺时，阿喀琉斯却回答：“不，伟大的俄底修斯啊，不要这么轻松地向我谈论死亡吧！我宁愿在人世上做一个帮工，跟随没有土地、没有什么财产的穷人干活，也不愿在所有死者中享有大权。”^②对死亡的无奈转换为对永生的眷恋，死亡与永生成了一问题的两面。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传说也蕴涵了人类以顽强的求生意志与死亡进行抗争的意义。对生活充满了爱而极度憎恨死亡的西西弗斯，因被诸神惩罚，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将一块巨石推向山顶。当他艰难地把巨石推向山顶，还来不及直起腰来舒一口气时，这块该死的巨石又按照诸神的旨意滚下了山谷。面对这样残酷的命运，西西弗斯却还是毫不犹豫、精神抖擞地重复那永恒的徒劳。这是因为他执著地迷恋着这火一般的生活和生机盎然的地上世界，不愿再回到阴森的地狱中去。西西弗斯这种徒劳的抗争尽管是悲剧性的、无济于事的，但他表现出的那种对生的执著和对死的憎恨，却为人类本性中渴望永生的冲动提供了绝好的诠释。

世界各民族都有过寻求永生的想法和做法。我们从最初的原始宗教神话、原始宗教艺术中如醉如痴的歌舞戏剧，以及与之相关的原始祭祀仪式中，就能感到涌动在人类天性中那对永生的渴望与冲动是如此的强烈，而这种超越死亡的渴望所产生的力量正是赋予原始宗教艺术以巨大生命力的重要元素。纳西族的“崇人抛鼎寻不死药”、哈尼族的“起死回生药”等民间传说，都表现了对死亡的思考和抗拒。这种追求永生的强烈愿望，在傈僳族民间歌谣《生存与死亡》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歌谣里有这样的话：

“创造倒是最伟大，发明倒是很巧妙，可是还不会创造不死，

②〔法〕帕斯卡尔，何兆武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7~158页。

③〔德〕斯威布，楚图南译：《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713页。

但是还不会发明不老。起死回生心才甘，返老还童眼才顺；假如能有回生药，死者都能复活啊！假如发明不老药，老者都能还童啊！死了复活心痛快，老了还童肝舒服。该造长生不死药，该创返老还童药。”^①

在这里，对人类的伟大创造的讴歌似乎在对死亡的焦虑中变得如此渺小，而对死亡的焦虑又化作了对永生的渴望，两种思想都同时得到了强烈的表现。而纳西族的一首情歌，则用平实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对青春会逝去、人终有一死这一客观现实的无尽遗憾：

“春天的花，希望冬天还会开放，但是冬天雨大霜大雪也大，所以这个花，是不会开放了。年轻的朋友啊，希望你永远年轻漂亮，可知青春有限，人会苍老死亡。”^②

如果说这些民间传说和歌谣主要充满了对永生的向往和思考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的炼丹术则是对永生追求的具体实践。然而，作为人的内在本质规律性，死亡又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人必有一死这一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类，破灭了人类生命超越个体有限达到无限的内心渴望，与人类心灵深处那一个向往永生的强烈愿望形成巨大矛盾。于是，超越死亡的宗教，便为缓解人类死亡的恐惧应运而生了。

费尔巴哈说：世上若没有死亡这回事，也就没有宗教。各种各样的宗教的产生最主要的动因就是帮助人类实现超越死亡的愿望，宗教成为人类超越死亡的途径。正是在人类渴求永生的强烈愿望与人必有一死的残酷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张力中，作为缓解人类死亡恐惧、满足永生心理需求的宗教悄然诞生了。无论是原始宗教还是人为宗教，其魅力都在于一种永生的许诺，为遭受死亡现实折磨、渴求永生的人们带来一种虽是虚幻却足以感到温馨的慰

①中国歌谣集成编委会：《中国歌谣集成》，中国ISBN中心出版2003年版，第889页。演唱者：裴阿欠；翻译者：徐琳、木玉璋。

②寇邦平主编：《纳西族民间歌曲集成》，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第260页。演唱：和玉莲、和惠琼；记谱：寇邦平；记词：王琼壁。

藉。其出发点都在于超越死亡，解决死后灵魂归宿的终极问题。人们毕竟知道了死后仍有另一个永恒世界存在，对死亡的恐惧与焦虑得到些许缓解，渴望永生的愿望在宗教世界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比如西方基督教所昭示的是，只要此生此世做一个虔诚的上帝的臣民，人死之后，就有希望获得整个人格与灵魂的不朽。佛教的生死轮回说、伊斯兰教的天园美好生活，也向人们传递了肉体虽死而灵魂永存的信息。无论是永生于天国的宗教信仰，还是中国儒家立功、立德、立言的不朽；也无论是长生成仙的宗教实践，还是自然主义的生死态度，都体现了人类对死亡的反抗和对永生的渴望。埃及的金字塔，作为人类超越死亡的巨型文化符号，永久地矗立在非洲尼罗河畔，东南亚各国大大小小的佛塔佛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西方国家的基督教堂以及各民族原始宗教所供奉的神像神龛，都寄托着灵魂不朽的愿望，讲述着人类试图超越死亡的心路历程。

可以说，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其实质都是为了逃避死亡的宿命，都是对战胜死亡威胁的抗争。只有人类才有宗教。作为在对死亡现实恐惧的缓解中产生的宗教，是人类抵御、驱散心灵所笼罩的死亡阴影的最古老武器，它把天国和地狱作为自己的基本命题，晓谕众生死后世界的一切。宗教创造了一个超越自然的彼岸世界，使人的行为特别是群体的行为超越了生物界所具有了为了获得食物与生殖的基本生理需要，而有了文化的意义。世界各民族由于社会形态、历史文化以及生存环境、生活经验的不同，所走的超越死亡之路也不尽相同。人类的宗教信仰种类多样，对死亡的看法也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死亡问题是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永恒主题和难解之谜。

（二）死亡问题是人类文化世界倾心关注的核心内容

死亡既有超验性的一面，同时也有经验性的一面。除宗教与死亡问题直接相关外，文化世界诸学科也从形而上或形而下层面对此进行观照。形而上层面如哲学，由于死亡所具有的超验性，任何人都无法亲身去真正地体验死亡，因而对它的解释首先得诉诸于哲学。生死问题如同有无问题一样，成为困扰和推动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根本问题，哲学承担着讨论死亡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终极性与非终极性，以及死亡和永生的个体性与群体性、死亡的必然性与人性的自由、生死的排拒与融合等诸多形而上问题。在柏拉图看

来,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到了现代,死亡问题更是某些哲学流派的热门话题。死亡同时还具有经验性的一面。作为经验实证对象,死亡是日常生活中时刻都在发生的自然现象,即肌体全部生命功能的彻底中止。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与科技的进步,以及由肉体死亡现象所引发的诸如临终关怀、遗嘱安排以及社会影响等问题的出现和讨论,使死亡问题成了除宗教、哲学以外的文学、艺术、生物学、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死亡问题在由哲学和宗教处理形而上层面的同时,还需其他学科对其进行形而下的观照。“人类所有高级的思想,正是起源于对死亡所做的沉思、冥索,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与每一种科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①20世纪,在西方世界还形成了一门以死亡原因及与死亡相关的各种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边缘学科——死亡学(thanatology)。西方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死亡问题的看法,死亡问题成为人类文化世界倾心关注的核心内容。正是由于人的死亡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死亡才被提到了如此高度。

(三) 死亡观与人生观密不可分

正如万俊人先生所言:“人之死不仅内在地关乎人之生,而且在人的文化本性上,人之死甚至先于人之生。正是因为人性化了的人先有了死亡的生命意识,才使得人采取了不同于其他自然物类的生的姿态和生的方式,确立了人不同的生存信念,将生命的‘生’转化为人类文化创造的‘活’与‘动’,此谓之人的‘生’、‘活’。”^②也就是说,人的死亡意识实际是生之动力。古罗马的塞涅尔在《致卢西留斯的第30封信》中对此问题有深入的论述,他认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想到死,一个人没有死的意志就没有生的意志,只有在死的条件下,我们才能够得到生。这是因为只有充分意识到我们的脆弱性和有死性,才能从容、有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③在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就已论述到生和死这一辩证关系,认为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的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

①〔德〕斯宾格勒,陈晓林译:《西方的没落》,台北华新出版有限公司1976年版,第113页。

②靳凤林:《死,而后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③转引自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化,又成为后者。“生死”问题作为困扰和推动人类哲学思维的一个根本问题,哲学甚至被柏拉图定义为“死亡的练习”,当代大哲学家叔本华更是把死亡看做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在海德格尔那里,人的自由也就是“向死的自由”,即“向死而在”。这是因为只有“向死而在”,我们才能意识到此在之存在的有限性,从而在烦畏的情绪中积极选择人生并筹划人生。

由于“死”与“生”是对立统一、密不可分的,故虽为谈死,实乃谈生。死亡问题具有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意义,或者说,死亡问题是人生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生选择、人生筹划的一个轴心问题。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或生命哲学的一种深化、延续和扩展。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才可能获得对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使生命具有紧迫感而克服惰性。知生为知死的前提,知死也为全面知生所必需,知死为建立全面透彻的人生观、价值观所不可或缺。因此,死亡观是一个同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关的问题。正是由于人意识到死亡的客观存在,才备感生之价值与可贵,从而更加珍惜生之美好。这一死亡意识能够激发人生潜力以创造生命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因此,死亡问题是一个人类终极关怀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永恒主题,也因此成为人类文化世界倾心关注的核心内容。

二、国内外对死亡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死亡问题的研究,国外文化界的探讨和思考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埃及,早在7 000年前,古埃及人就已有了相当系统的灵魂不死说,集中表述于世界上最早的死亡问题专著《死亡的书》。该书描述了人死后灵魂在冥界接受地狱之王阿雪笠斯和智慧之猿首神石斯的审判,按其生前行为之善恶而行奖惩的故事。在古印度和古希腊,也产生了颇为明晰的轮回再生观念,创立于印度的佛教便是一个最好的佐证。毕达哥拉斯被认为是古希腊哲学家中第一个倡说灵魂不死和轮回转世的人,他与赫拉克利特一道,被认为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对死亡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只

是赫拉克利特是用一种自然宇宙观来解释人的灵魂及其生灭的，而毕达哥拉斯则用对立面和谐的辩证原则来解释生与死的同一性。苏格拉底认为死的境界二者必居其一：或是全空，死者毫无知觉；或是如世俗所云：灵魂由此界迁居彼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死亡是自然之身的解体，这一观点向着科学解释人的死亡现象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柏拉图关于“哲学是死亡的练习”一说成为流传千古的哲学定义，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整个灵魂在人死后继续存在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万物中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死亡，因为死亡是终结，而且对于死者来说，一切东西都随他个人的死亡而丧失了其全部价值。在古典时期，德谟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早期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死亡哲学的积极成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把希腊死亡哲学，特别是把关于死亡本性的哲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希腊古典时期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古希腊起，死亡问题成为西方世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先哲的灵魂观，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臻于成熟。

从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对死亡的哲学思考，到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死亡本性的再思考；从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等人对死亡恐惧的治疗，到笛卡儿、斯宾诺莎等人对死亡的漠视；从叔本华、尼采、柏格森关于意志与死亡的探讨，到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对存在与死亡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死亡问题在西方哲学文化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历代西方哲学家在死亡问题上多有论述，且内容极为丰富，死亡哲学课程及有关专著、论文早已多到人们司空见惯的地步。到了现代，死亡问题更是某些哲学流派的热门话题。尤其是20世纪死亡学诞生以来，文学、艺术、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都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死亡的看法，设立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死亡心理学、死亡社会学、死亡教育学、死亡法学、死亡医学等方面的著作。具有代表性的如：《我们怎样死》（〔美〕舍温·纽兰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向死而生》（〔德〕弗兰茨·贝克勒著，张念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生与死的对抗》（〔美〕诺尔曼·布朗著，伍厚恺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死亡文化史》（〔法〕米歇尔·沃维尔，高凌翰、蔡锦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自